

三苏与三衢

黄材运

衢州赵抃与三苏

三衢人物最早与三苏的交谊,当始于赵抃。他们交往始于蜀地、延及终身。赵抃更以知遇之恩,成为苏家世代感念的恩公。

嘉祐三年(1058),赵抃自睦州调任梓州路转运使,后改成都府路转运使,二度入蜀为官。彼时苏轼、苏辙新科进士及第,因母丧归乡丁忧,眉州恰属成都府路管辖,兄弟二人依礼拜见这位父母官。赵抃虽未见过他们的父亲苏洵,却早已听闻其才名,对这位大器晚成、闭门苦读通六经百家的饱学之士心生敬佩。苏洵满腹经纶却不愿应试入仕,空有才华而仕途无门,赵抃惜才爱才,以成都府路转运使身份郑重向朝廷举荐,力陈苏洵“学行推于乡里”,终助苏洵得授试校书郎。这份“举人于不相识之中”的知遇,让孤傲的苏洵深为感动,亲作《谢赵司谏书》,赞赵抃“去世俗远矣”。这一荐,不仅为苏洵打开仕途之门,更成为苏家家运兴盛的关键节点,苏轼、苏辙对赵抃的荐父之恩,终其一生铭记于心。

苏洵去世后,苏轼、苏辙与赵抃的情谊愈发深厚,二人归京后拜谒已是参知政事的赵抃,书信往来、诗筒唱酬不断,成忘年之交。赵抃为衢州好友梁准求诗,苏轼欣然提笔作《绿筠亭》;赵抃知杭州修钱氏祠宇,苏轼千里撰文《表忠观碑》;赵抃致仕归乡,苏轼作《赵阅道高斋》盛赞其高洁,兄弟二人同致贺启,称颂其德节。赵抃次子赵帆任温州通判时为父戏娱娱亲,苏轼、苏辙赋诗赞誉;二苏游庐山寄诗,赵抃晚年欣然和诗,字里行间满是老友间的亲昵与牵挂。

赵抃逝世后,赵帆恳请朝廷为父撰神道碑,哲宗钦点苏轼执笔。苏轼一生极少为人撰墓志铭,曾放言“轼于天下,未尝志墓,独铭五人,皆盛德故”,赵抃便是其中之一。他挥笔写下三千五百字的《赵清献公神道碑》,以文言志、以情铺陈,详尽记述赵抃一生功业,字里行间尽是景仰与感念。这篇碑文,不仅是研究赵抃的珍贵文献,更让赵抃的清风亮节借苏轼之笔流芳百世,也让苏赵两家的情谊,镌刻于金石、流传于千古。

江山毛氏父子与二苏

江山毛氏父子毛维瞻、毛滂,与苏轼、苏辙的交谊,起于患难、承于家风、终于知己,是北宋文坛患难与共、文脉相承的典范。

元丰二年(1079),“乌台诗案”事发,苏轼锒铛入狱,苏辙上书愿以官职赎兄罪,被贬筠州监盐酒税。彼时,苏辙戴罪之身、仕途困顿,又逢筠州大水,官舍被毁,几近无家可归。时任筠州知州的毛维瞻,年届七旬,不惧政治牵连,不顾旁人冷眼,不仅为苏辙安置居所,更待之以礼、引为知己。二人朝夕相伴,游园、赏月、登高、赋诗,三年间诗文唱和七十余首,结下深厚的忘年情谊。毛维瞻致仕还乡,苏辙作诗惜别;苏轼感念毛维瞻照拂弟弟,亲书陶渊明《归去来辞》相赠,赞其高洁人品,书信往来间满是温情。

毛维瞻去世后,其子毛滂延续父辈情谊,成为二苏的忘年挚友。毛滂为毛维瞻老来子,年少有才、豪饮善诗,娶赵抃孙女赵英为妻,自幼便随父结识二苏。他不担心苏轼贬谪身份,亲赴黄州拜访,以诗文求教;苏轼赞其“文词雅健,有超世之韵”,虽因官场掣肘未能即刻举荐,却始终心系其才,后专上《荐毛滂状》,力荐其入仕。元祐四年(1089),毛滂任杭州法曹,所作《惜分飞·泪湿阑干花著露》哀婉动人,苏轼闻之大为赞叹,亲自追还款待,助其一词名动天下,毛滂也因此奠定其北宋潇洒派词宗的地位。

二苏再度遭贬,远谪岭南、海南,毛滂不离不弃,书信频传、寄茶赠诗,慰藉友人贬谪之苦。苏轼在惠州筑白鹤峰新居,毛滂寄赠江山毛峰茶,苏轼回信称“永以为好”,将这份患难之交升华为知音之谊。苏轼病逝后,毛滂睹其绝笔,泪洒诗笺,以“霁月光风开玉轴,千年仿佛见斯人”寄托哀思,用一生坚守,续写了毛、苏两家跨越两代的生死情谊。

眉山三苏,文耀千秋;三衢大地,文脉绵长。北宋年间,苏洵、苏轼、苏辙父子与衢州名士赵抃、毛维瞻、毛滂、王介、吴亮等人相交相知,以才相惜、以义相扶、以诗相和,跨越千里山河,织就一段宋韵文坛的千古佳话,让眉山文气与三衢风骨相融共生,流传至今。



苏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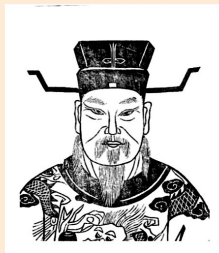
苏轼。



苏辙。



赵抃塑像。



王介。



毛滂《东堂词》。

《湖北金石志》。

常山王介、吴亮与二苏

常山王介,出身“一门九进士”的科举世家,与苏轼、苏辙同科中制举,以同年之谊,成为二苏仕途与文途上的重要知己。

嘉祐六年(1061),宋仁宗亲自主持制科考试,这是宋代难度极高的选拔考试,三百余年仅49人中中式,三等为最高等。苏轼以三等夺魁,王介、苏辙分列四等,三人同登金榜,名震朝野。宋仁宗曾喜言“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”,指的便是苏轼、苏辙,而王介位列其间,三人自此结下同年之谊。

王介性格耿直,早年与王安石交好,后因反对新法遭疏远,却始终坚守文人风骨。他与二苏的交往,虽史籍记载不多,却以同年情谊为纽带,同游唱和、惺惺相惜。王介家族以科举兴家,“一门九进士,历朝笏满床”,是衢州文脉的标志性家族;二苏为文坛宗师,眉山文风与三衢家学相互辉映。王介去世后,苏轼亲作《同年王中甫挽词》,追忆当年同科之盛,悼念这位耿直有才的同年挚友。后来在元丰七年(1084),又作《王中甫哀辞》,进一步表达哀思。他们之间这份科举场上的相知,定格为北宋文坛的一段温情往事。

吴亮,字君采,常山同门(今球川镇九都村)人,元丰二年(1079)进士,官至吏部郎中。苏轼贬谪黄州期间,吴亮时任武昌主簿。元丰五年(1082)二月,苏轼与友游武昌西山,吴亮听闻后携酒往迎,与苏轼等同游并题名山壁,此见于《湖北金石志》。此后二人交往甚密,常常把酒言欢。北宋文学家张舜民《画墁集》有载:“(元丰六年秋)苏子瞻以舟涉江,同诣武昌县。县在樊溪之东,隔樊山五里许,即吴之西都,有吴王城。同县令季观、佐吴亮、严游樊山,步出西门,涉寒溪,迤迳上,凡两寺,在山中。下寺有观音泉,澄澈可爱。”

宋代士人风雅独具,相互之间盛行赠花。吴亮为此寻觅一些奇花赠予苏轼,但苏轼似乎并不领情,在致书吴亮时直抒喜好:“惠花已领,‘影灯’未尝见,与其见此,何如一阅《三国志》耶?”苏轼好酒,在写信给吴亮时,自嘲未尝作私酒,只酿蜜酒,言语诙谐,足见双方友谊已到十分随便的程度。

尤值得一提的是,苏轼在与吴亮交往中还链接着高斋先生赵抃,这也佐证了赵抃一辈子琴鹤相随的雅趣。《苏文忠公全集》卷七十一《书士琴·赠吴主簿》这样记载:“武昌主簿吴亮君采,携其故人《士琴之说》与高斋先生之铭《空同子之文》《太平之颂》以示余。余不识沈君,而读其书,反复其义趣,如见其人,如闻士琴之声;余昔从高斋先生游,尝见其宝一琴,无铭无识,不知其何代物也。请以告二子,使从先生求观之。此士琴者,待其琴而后和。元丰六年闰六月二十四日书。”元祐六年(1091),苏轼在赴颍州途中,再次为吴亮《琴说》作跋。

吴亮以一介县佐,在苏轼政治失意、生活困窘之际,置酒相待、惠花赠文,以文人的风雅与真诚,为东坡先生至暗时刻雪中送炭。这份交谊,虽不似赵抃毛氏父子那般深厚,却同样以心灵契合与士人间的“情绪价值”,在苏轼生命中留下明亮印记。